

钩沉

在千年川藏线茶马古道上，有一首悲壮的人生“背”歌鲜为人知。由于四川雅安等产茶地进入青藏高原的道路被高耸入云的二郎山等天堑隔断，险要的山路甚至连骡马也不能通行，千百年来，由川藏茶马古道进入青藏高原的茶叶要靠人力背过层峦叠嶂来到藏区物资集散地康定。

本报特约撰稿 聂作平

1911年，大清帝国宛如汪洋中的一条破船。这年夏天，帝国西部重镇成都，受聘于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的美国教师那爱德应清政府邀请，动身前往四川西部作一次为期数月的地质调查。

要有背夫，就有了背夫

最近15年间，我先后七八次前往雅安市天全县下辖的一座偏远小村庄。雅安以西，四川盆地开始向青藏高原过度，大地向着天空的方向缓慢而又固执地抬升。天全县城西距雅安市区约30公里。出天全县城往西，大约八九公里，就是我前往的小村庄。那里，两列青翠的山峰逶迤不绝，中间是潺潺流淌的青衣江支流天全河。小村庄位于其中一列山峰的半山腰。村外，两条小溪汇入天全河。因小溪时常干涸，故而得名大干溪、小干溪。顺理成章的，这座两条干溪旁的村子，也就得名干溪坡。后来，大概是有了寄托一种美好的愿望，改干为甘，就有了现在的名字：甘溪坡。

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的小村庄，几排木结构的房屋依山就势，高高低低地拥挤在狭窄的台地上。一条曲曲折折的石板路斗折蛇行，从村子中央钻过去。大约行走的人太少，铺路的石板角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苔藓。雨后，苔藓如同青色的地毯，爬行着一只只肥大的蜗牛。白色的烟岚从对面的山麓飘过来，乘着一阵山风，又向远处飘过去。向西遥望，更为高大的山峰连绵如城郭。那里，就是川藏线上的第一道天险：二郎山。村头，一株碗口粗的杉树下，竖着一方两米多高的石碑。石碑上是苍劲的行书：古道背夫铭。

1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甘溪坡，就是为了这块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知道了那个业已消失的群体：天全背夫。那一年，天全政府打算为背夫建一座纪念馆，并立一块碑。经朋友推荐，我受邀撰写碑文。一个初秋的下，秋雨乍停，我来到甘溪坡，并采访了几位当年的老背夫。15年后，为了写这篇文章，翻箱倒柜，我居然找到了当年的采访笔记。只是，当我最近一次前往甘溪坡时，曾经采访过的几个老人只有一个还在人世，且已严重失聪。事实上，虽然做过背夫的天全人数以千计，如今还活在人世的，估计不到十个了。随着亲历者的不断凋零，这一古老的职业终将成为地方史料里几行了无生气的方块字。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尤其是与西藏毗邻的四川和云南更是茶叶的主要产区。与这两个地区唇齿相依的西藏，虽然对茶叶十分渴求，却由于酷寒的高原气候，无法种植，只能依赖川滇茶叶入藏。在以马匹作主要动力的古代，内地主要为农区，不产马匹，西藏却盛产良马。这种出产的互补性使两个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产生了，茶马古道也就呼之而出。

据比较可靠的史料记载，茶叶是唐朝时传入西藏的。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即今西藏)时，偶然在帐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常鲁公回答：“这是解渴去烦的好东西，名叫茶。”赞普仔细察看了一下，笑着说：“我也有这种东西。”并命手下人从库房中扛出一大堆。常鲁公一看，果然都是茶叶，而且品种繁多，分别有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和四川出产的各种名品。从那以后，喝茶的习惯传入西藏。这种解渴去烦的东西对以肉和奶为主食的藏族人民来说，是十分相宜的。他们很快就将茶当作了生活必需品——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谚也有“汉家饭果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致。

茶马古道的路线大致有南北两条：一条自普洱茶产地普洱出发，经大理、丽江、迪庆、德钦，到达西藏芒康、昌都，然后再抵达波密和拉萨，尔后辐射至藏南

的泽当和后藏的江孜、亚东，或者出境到印度和中亚；另一条由四川雅安一带出发，经天全、泸定、康定、巴塘到达昌都，尔后线路与滇藏线重合。

不论是茶马古道的北线还是南线，大多数地区，运输茶叶的都是骡马，并形成了历史悠久的马帮文化。然而，茶马古道北线的天全到康定，这200多公里的路途，其间要翻越难以计数的大山，穿过多条冰冷刺骨的雪山融化的河流，不少路段只有一两尺宽的羊肠小道，且大多行进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高大的骡马根本无法通行。

有需要就有创造。无论帝王的意志还是大自然的严峻，都无法阻挡人类沟通与交流的愿望，更何况这样一条关系到两个民族、两个文化区域的重要商道。于是乎，天全背夫的出现成为必然，并因历上千年的茶马古道而成为二郎山麓的一大“特产”。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幅旧时茶馆里常常可见的对联，让川茶名扬天下。蒙顶山坐落在距天全只有50公里的地方，相传它的种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不仅蒙顶山产茶，蒙顶山周围百公里范围内的多个地区都以产茶著称。天全一带，自古就有种植茶叶的传统，遍布山间的茶园，已有上千年历史。地方史料记载，天全大规模种植茶叶，始于唐朝初年。其时，“天全东西河流有龙尾峡所阻，水道迫仄，谿为大泽，有龙尾海子之称。”一个后来被封为英烈侯的孟姓将军，凿开龙尾峡，从此水流通畅，水患平息。此后，他“于蒙山采茶子，于山谷间遍种之”“教其民以树艺采焙之法”，成为天全种茶之滥觞。载于《天全州志》的一首竹枝词，描写天全采茶的盛况说：“采茶刚趁月光明，大妇相随小妇行，采到春心尖处纯，春愁一缕发幽情。”

藏汉接合部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包括天全在内的雅安地区生产的茶叶，绝大多数都用于边贸，人们称为边茶。始于盛唐的茶马互市让天全脱颖而出，天全茶叶声名鹊起；至于天全背夫，也在历史深处应运而生。

拐子窝：仿佛用象形文字写就的史书

1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甘溪坡采访时，70岁的李攀钰是几个老人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他身体精壮，穿着缀有补丁但洗得还算干净的衣服，大口大口地抽着叶子烟。他坐在一株挂满了红色果实的橘树下，慢条斯理地给我讲述逝去的背夫生活。15年后，我为了拍摄《中国影像方志》之《天全篇》而又一次看到他时，他已垂垂老矣，曾经挺直的背驼了，目光浑浊了。甚至，即便对着他听力仅存的耳朵大喊大叫，他也只能听得见零星的语言碎片。至于比他更年长的几位老人，已经先后过世。

在我和李攀钰的孙子交谈期间，大约是我听到了背夫两个字，老人原本昏暗的目光突然明亮了一下。之后，他长久地注视着门前的小路。——距老人两三米外的堡坎下，古道曲折如蛇，穿过两排房屋后，冲进村后的林子。那就是昔年背夫们往返于天全与康定之间的必经之路。初到甘溪坡的人，都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那就是铺砌古道的青色石板上，散布着一个一个小小的坑窝。这些坑窝，人们称为拐子窝。

拐子窝，和天全背夫人手必备的一件重要工具有关。甘溪坡村头的古道背夫陈列室，大约游客稀少，长期大门紧锁——至少，在它修成之后我去过的几次里，每一次都是铁将军把门。不过，透过门缝，依然能看到陈列在角落里的两种两三尺长的丁字形棍子。这就是背夫们终日握在手里的拐棍，当地人把它称为拐子。这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拐棍，是背夫们必不可少工具。可以说，没有它，背夫寸步难行。

多年以来，生产好的边茶都用竹茶包裹并扎成长条形，称为茶包子。每一个茶包子的重量是标准的：16斤。一般来说，一个背夫一次能背10到15个，最厉害的则能背重达320斤的20个乃至更多。茶包子一个接一个码到木制的背架上，背夫再将背架负于双肩。路途上的每一天，从早晨出发到傍晚住下来，其间的十几个小时里，背架都不能从背上解下来——解下来之后再背上去极其麻烦，且沿途也很少有那么宽的地方可供解下又背上——因此只能一直背在背上。

哪怕铁打的汉子，也不可能从早到

历史深处的天全背夫 一路「背」歌

晚不歇息，不吃饭，不小便。这时，拐棍就派上用场了。背夫需要停下来歇息时，只需将拐棍的一头撑住背架底部，便能将茶包子的重量转移到拐棍上，从而得以歇口气，喝口水或是撒泡尿。

拐棍除了作为休息时的支撑，背夫还依靠它涉过险急的溪流，走过泥泞或积雪的山路。有时在山间遇到野狗或蛇虫，它又是自卫的武器。拐棍底部用坚硬的金属包卷，以延长使用寿命。意想不到的，一代代背夫手持拐棍接力般地行走于途，在拐棍底部金属的一次次敲击下，古道上竟形成了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小坑。从天全到康定，无以计数的小坑仿佛是一部用象形文字书写的史书，忠实而深刻地记录了茶马古道的辉煌，也记录了天全背夫的艰辛。

李大爷的记忆

翻开15年前的采访本，我当年写下的采访手记依然清晰。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有着淡淡秋日暖阳的下午，除了李攀钰外，其他几个老人中，还有一个也姓李。他年事最高，做背夫时间也最长。因而，大多时候，都是他在回忆。可惜，当时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只好称他李大爷。

采访之前，我以为背夫是专职。李大爷明确告诉我，专职的背夫确实有，但非常少。他们绝大多数本身都是种地的农民，每到农闲，趁地里农活少，出来兼职做背夫，以便挣一笔庄稼之外的额外收入。想想也是，天全地处山区，满目青山，耕地少而珍贵。如果只从土里扒食，压根儿就养不活一家人。幸好，只要身强力壮，只要吃苦耐劳，还可以当背夫。以甘溪坡为例，当时村里的男人，只要是能动弹的，几乎都做过背夫。

李大爷记忆中，天还没亮，他就在家里的急急忙吃早饭，走到十多里外的天全城，从商号取了茶包子往回赶。一直要走到满山暮色，才又回到甘溪坡。家中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背着沉重的茶包子，向西边天际更高更陡的大山缓缓前行。从天全到康定，如果背得轻的话——所谓轻，一般指背10个以下的茶包子；来回一趟需要11到12天。如果背得重的话——所谓重，一般指背10个以上的茶包子——李大爷自豪地说，他的最高纪录是20包半——来回一趟则需要15天。

去时负重，回时也不闲着。从天全到康定，背夫背上的是茶叶；从康定回天全，背夫背上换成了羊毛。今天，天全到康定已通高速，100多公里的路途，不过几十分钟行程。但在高速通车之前，即便已经有了川藏公路，由于要翻越二郎山，大部分路段陡峻坡险，汽车也需要好几个小时。更何况，在既没有汽车也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的年代，背夫们必须背负两三百斤的茶包子，一会儿穿行于原始森林，一会儿涉过冰冷湍急的小溪，一会儿攀上白雪飞舞的二郎山山口，一会儿贴着崖壁小心地从两尺宽的石壁上越过万丈深渊……尤其天全多雨，一年有200多个雨天，其行路之难，就像天全民间俗语所说的那样：“天天下雨天，天天雨，没有鞋爪子钉钉，上不了梅子坡顶。”——梅子坡只是县城附近一座低矮小山，其行走已是如此艰难，何况横亘在盆地与高原之间那些三四千米的大山。所以，当年的行走极为狼狈，当地人称为“上山学牛叫，下山做狗爬。”种种艰难与危险，哪怕几十年以后再追忆，我也能感受到几个老人的沉重和辛酸。

背夫们背上除了茶包子，还有沿途要吃的粮食。从天全到康定，虽说大山纵横交错，但就像藏在林间的甘溪坡一样，每隔十多里路途，就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村庄或集镇。不论村庄还是集镇，一定会有供来往背夫歇脚的驿站——当地人把这种最低档的既卖简单食品又提供住宿的驿站称为幺店子。川语里，幺，也就是小的意思。像甘溪坡，它是茶马古道出了天全后的第一座村庄，当年便有好几家生意兴隆的幺店子，并有茶马古道第一站的名称。



▲这是1903年法国人方苏雅拍摄的四川背夫从泸定背茶到康定的照片。

新华社资料片

脚基坪、紫石关、小渔溪、长河坝、两路口、鱼通沟……哪怕背夫生涯业已结束几十年，李大爷对那些曾经熟悉的驿站依旧如数家珍。幺店子都提供饮食，但出于节约的天性，背夫们都是自带玉米面和玉米饼，以及盛水的葫芦。白天忙着赶路，累了饿了，伸出拐棍将背架一撑，吃两个冷玉米饼，喝几口冷水就算午餐。如果能靠着大树或岩石打个盹，那就是天大的享受。黄昏时分，远远地看到幺店子门前的青布帘招，艰难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又可以得到一夜的休息。于是，在老板娘的招呼下，背夫们次第放下背架，走进院子，一个接一个地借用幺店子的锅灶，拿出自带的玉米面，煎几个玉米饼，熬半锅玉米羹。按惯例，幺店子都会出售豆腐。对住宿的背夫，一律赠送豆腐一块。许多年过去了，李大爷还记得鱼通口那家幺店子，“那家的老板娘姓啥我忘了，只记得脸上有麻子，手脚麻利，做的豆腐又白又嫩，每个背夫都送一块。晚饭就是玉米饼、玉米羹和烧豆腐，胀得肚皮痛，还想吃。”

女背夫更加艰难和憋屈

按我最初的想象，背夫这种以命相搏的职业，只能属于男人，且只能属于精壮的年轻男人。然而，采访中却得知，行走在天全到康定这条古老商道上的，除了男人，竟然还有女人。与男背夫相比，女背夫更加艰难和憋屈。天全山间多竹，每到三月，春笋竞发。其时，家有女背夫的人家就会钻进竹林，捡一些笋壳回家。就像背夫离不开拐棍一样，女背夫还得多一样装备，那就是笋壳。小心擦去笋壳上的绒毛后，再用剪刀略作修整，使其两端卷起，呈一个凹槽形。女背夫领取茶包子上路之前，一定会记得带上几片笋壳。

原来，背夫从早晨出发到晚上住店，其间，背架不能从背上取下来。男背夫小解时，只需将拐棍撑住背架即可。性别不同，女背夫没法像男背夫那样。女背夫只能将笋壳贴近私处，让尿液顺着笋壳的凹槽流到地上，以免打湿裤子。天全地处民族交界处，自古多匪。虽说背夫们总是十个八个结伴而行，也未必有赶不上队伍而落单的。尤其是女背夫，常常沦为匪徒抢劫甚至凌辱的对象。至于一间房子就是一张超级大床的幺店子，女背夫也只能放下尊严，和那些陌生男人挤在同一床被盖下。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草根来说，所谓尊严，远不如能够让让他们活下去的几块散碎银两更重要、更实在……

那么，如此含辛茹苦地背一趟，到底能挣多少钱呢？李大爷的说法是，就普通背夫来说，如果背十来个茶包子的话，大概能挣5块大洋。其时，一块大洋能买25斤大米。放到今天，也就四五百块钱的样子。十多天辛劳，只有四五百块钱收入，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彼时彼境，100多斤大米，却是一家人赖以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和支撑。对这些卑微的生命来说，活着，哪怕艰难地活着，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关于背夫的两个故事

李大爷一家几代人都做过背夫。在我的采访笔记里，记录了他讲的关于背夫的两个故事。故事之一是甘溪坡附近某山村，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头猪。猪养肥了，打算弄到山下城里去卖。路又陡又窄，没法像山下那样把猪装进用竹条编成的猪笼再抬进城。无奈，只得请了力气最大的一个背夫，把猪背下去。谁知，活着的猪不比茶包子，不断在竹篓里挣扎。要命的是，当背夫小心地贴着石壁经过一道高高的悬崖时，猪的挣扎终于让背夫失去平衡，连人带猪跌了下去。等人们从远处绕到山沟时，人和猪都已气绝身亡，唯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在弥漫。为了赔偿背夫，养猪的这户人家只好变卖了祖传的两亩地。

故事之二的主角是李大爷的父亲。民国二十五年，即公元1936年，国民政府开始修筑从天全到康定的公路。这段历史，我曾见过摄影家孙明经当年拍的照片。他的镜头里是一群正在赶路的背夫，背夫脚下，不是逼仄的山路，而是宽阔平整的刚完成的毛坯公路。至于背夫所背的东西，也不是茶包子，而是供筑路工人食用的大米。孙明经为这幅照片题写的说明文字是：“天全川康公路之背米者，过飞仙关而至天全，再向西南行，在二郎山一带，公路蜿蜒于群山之上，高2900米，森林密布，人烟绝迹，工程艰巨，路工所食之米，需自雅安等地背负数日之行程，前往施工地带接济。现公路已修通至泸定，与旧道相汇合。”

孙明经可能不知道的是，筑路期间，天全背夫除了背米，还背过死人。据李大爷讲，由于工具太原始，环境太恶劣，筑路工人不得不腰系长绳，悬在半空作业。为此，工地上每天都有人遇难。这些遇难者的尸体，绑在一块木板上，背夫把木板连同尸体一起背到天全。根据路的远近，有时要背两天，有时要背三天。因为背的是尸体，幺店子自然不同意入住，背夫们只能露宿于凸出的山崖脚下。夜里，凄风苦雨，四周一片昏黑，近在咫尺的林子

里，传来野兽的哀鸣。眼前除了一堆微弱的篝火，只有一具渐渐发臭的尸体……

天全山下多竹，每到三月，春笋竞发。其时，家有女背夫的人家就会钻进竹林，捡一些笋壳回家。就像背夫离不开拐棍一样，女背夫还得多一样装备，那就是笋壳。小心擦去笋壳上的绒毛后，再用剪刀略作修整，使其两端卷起，呈一个凹槽形。女背夫领取茶包子上路之前，一定会记得带上几片笋壳。

原来，背夫从早晨出发到晚上住店，其间，背架不能从背上取下来。男背夫小解时，只需将拐棍撑住背架即可。性别不同，女背夫没法像男背夫那样。女背夫只能将笋壳贴近私处，让尿液顺着笋壳的凹槽流到地上，以免打湿裤子。天全地处民族交界处，自古多匪。虽说背夫们总是十个八个结伴而行，也未必有赶不上队伍而落单的。尤其是女背夫，常常沦为匪徒抢劫甚至凌辱的对象。至于一间房子就是一张超级大床的幺店子，女背夫也只能放下尊严，和那些陌生男人挤在同一床被盖下。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草根来说，所谓尊严，远不如能够让让他们活下去的几块散碎银两更重要、更实在……

那么，如此含辛茹苦地背一趟，到底能挣多少钱呢？李大爷的说法是，就普通背夫来说，如果背十来个茶包子的话，大概能挣5块大洋。其时，一块大洋能买25斤大米。放到今天，也就四五百块钱的样子。十多天辛劳，只有四五百块钱收入，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彼时彼境，100多斤大米，却是一家人赖以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和支撑。对这些卑微的生命来说，活着，哪怕艰难地活着，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苍茫的天涯路

蜜蜂采蜜，没想到采来了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为了生计而奔走的背夫，他们一定也没想到，一代接一代的行走，支撑起了一条古老而繁荣的商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藏汉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正是通过一双双布满老茧的肩膀和双脚来完成的。

前面说过，茶马互市起源于唐朝。对唐朝来说，除了想在经济上增加财政收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以茶治边。因此，历代中央王朝对茶马互市的政策，时时都在调整。总体来说，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国家专营，一种是公私皆可经营。唐朝末年，朝廷下令所有种茶叶必须全部由政府垄断。北宋初年，又改由专门的茶户种茶并焙茶，政府专款收购后再经营。北宋末年，开始实行茶引法，也就是商人可以经营边茶，但要向政府交钱取得茶引——相当于今天的配额。明朝初年，为了执行羁縻政策，朝廷对茶叶严加管制，茶引制改为引岸制，即由国家固定产销地区及课税标准。鉴于天全的重要性，朝廷在天全县城设置了茶马司和茶局，负责茶引批验、调运茶叶的工作，全部交给军队，以至于“十里为铺，铺有兵，兵有程，月有给，苟不如式，罪罚随之。”为了杜绝民间私贩茶叶，法令竟严酷到“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凌迟处死”的地步。至于茶树苗和茶籽，更是严禁运出藏汉交界的飞越岭和马鞍山。直到明朝中期的弘治年间，朝廷对茶叶的严管终于不再，政府开始允许私人经营，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是故，从15世纪末年的弘治年间起，以茶叶为大宗的边贸给天全带来了一个富庶锦绣的花样年华。

天全下属的始阳镇，是仅次于县城的第二大镇，也是曾经的边茶集散地之一。如今，始阳镇略显杂乱的房舍之间，鹤立鸡群地残存着一片老建筑。这片老建筑虽然被破，却依然以高大的梁柱和精巧的结构、庞大的体积透露出曾经的宏伟。这就是世代经商的高氏家族筹资于清朝初年修建的茶叶仓库。据考证，它也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仓库。清朝中期，由于经营不善，高氏家道中落，仓库被朝廷收购。如今，它已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残存的面积仍超过两千平方米。

一张附属于清代《天全州志》中的始阳地图则显示，就在这片弹丸之地上，曾经修建有众多会馆，如山西会馆、陕西会馆、贵州会馆——会馆，是同一籍贯的商人们叙叙乡情，沟通有无的会所。此外，还有武庙、奎阁、文昌官和书院等一系列公共建筑。几十年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在川西考察期间来到天全，事后撰文称赞始阳镇说：“庙宇甚多，建筑均颇宏丽，商贾以茶叶和布匹销售为主。”

如果说这些繁荣是台前的话，那么在后台为繁荣默默效力的，就是籍籍无名的背夫。没有他们的艰难行走，就没有这些繁荣昌盛。

救命树和暗号树

深入天全考察之前，我一直以为，从天全通往康定的茶马古道只有一条，也就是李大爷他们所走的那条。随着考察深入和查阅地方文献才得知，事实上，背夫们接力于途的古道有两条。一条，就是从天全向西经甘溪坡而行，即李大爷和甘溪坡背夫们世世代代走的这一条。这一条沿途多为高山峡谷，道路狭窄险峻的马鞍山和二郎山——李大爷对当年经行的马鞍山记忆犹新。他说，由于地势高峻，每年九、十月山中就大雪纷飞，有时候，雪把路完全盖住了，只能用拐棍把雪推开，才能隐约看到路基。

与小路相对的是大路。大路又称始阳路。从雅安或名山而来的茶叶，西行进入天全境内的多功能坝，溯茶经河上行，翻过飞越岭，经汉源后抵达泸定，进一步到达康定。大路初辟于隋朝，唐朝以降，历代都有修整和拓宽，相当于政府养护的官道。与小路相比，大路更安全也更好走。不过由于绕道，所耗时日更多。对许多背夫——尤其是家住小路旁边的甘溪坡一带的背夫来说，他们的首选仍是更加危险的小路。匪徒拦劫，野兽出没，道路崎岖，山洪和泥石流迅雷不及掩耳，背夫生涯危机重重。作为天全末代背夫，李大爷曾遭遇过多次危险。一次是在长河坝遇到劫道的土匪，幸好腿脚灵活，跑得快，趁着土匪抓住他之前扔下背架跑进了茂密的林子——对沉重的茶包子，土匪没有兴趣。再一次是在门坎山遇到山洪，即将跌进山谷之际，山崖上的一株栎树挡住了他。“要不是那棵栎树，哪里还有人哦，又哪里还有我这满堂儿孙哦。”几十年过去了，李大爷对那株有救命之恩的栎树饱含感激。

经由天全作家李存刚指引，我们一行沿着简陋的石板路穿过甘溪坡。村子里静悄悄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如同几十年前那些趁着农闲去做背夫的先辈们一样。尽管退耕还林后，基本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但要想手头有几个钱，要想让生活更高质量一些，还是得出外打工。偶尔能看到两三个老人和妇女，面容沉静。当然，还有留守在家的儿童。他们清脆的笑声与村后树林里传出的画眉声交织在一起，让这个沉寂的小山村多少有了一些人间烟火的温暖和柔情。(下转 11 版)